



【茂林茶话】

一项公共政策的推行,不仅在学术上要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很多时候还是要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做的危急情况下才能做出决断。

分税制改革的政治决断与技术分析

尹振茂

“手中无米,叫鸡都不来。”对于分税制改革前夜中央财政的窘况,朱镕基曾这样评价,业界对此的另一种说法是“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根据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披露的数据,1980年到199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5%,但在此期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从1979年的28.4%一路下降到1993年分税制改革前的12.6%。同时,在整个财政分配中,中央财政的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4年的41.5%下降到1993年的22%。

对于分税制改革取得的成功,朱镕基认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按照朱镕基1993年7月23日在当时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

上的主题发言的说法,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那么,对国家如此重要的改革为何迟迟到1994年才决定在全国推行?

其实,早在1980年,时任财政部部长吴波就表示当时拟在全国推行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不可行,认为按当时财政的基数,定额包干就把财政包死了,事业是发展的,一旦有天灾或突发事件,国家财政就一筹莫展、无能为力,从而力主中央与地方分税。但后来中央会议还是决定采取财政包干制。

当时与吴波辩论的另一方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此后,赵在年内又升迁至国务院总理。吴则在1980年8月初辞任财政部部长,为当时的这场“吴赵大战”划上了句号。辞职时,吴的部长任期还差10天满一年,是历任财政部部长中除

邓小平之外任期最短的。

但随着财政包干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政府内部的智囊机构对此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多。

1986年,当时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的贾康就指出,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中国财政改革的方向,必须改变财政包干制。几乎与此同时,以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为代表的“整体协调”改革派也提出了分税制的改革方案。

不过,尽管1980年代末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某些中央机关还出现不借钱工资就发不出去的状况,甚至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还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不还的事情,但直到1993年上半年,中央政府对于是否要推行分税制还是迟迟未能做出决断。

就在此时,“王胡报告”应运而生。该报告由政治学家王绍光和国情研究

专家胡鞍钢合著,原来的主标题是“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副标题是“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报告”,指出再不推行分税制后果会非常严重,搞不好中国就是下一个南斯拉夫。当时,南斯拉夫联邦6个成员国中的4个先后在1991年和1992年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联邦由此解体。

“王胡报告”1993年6月中旬首先在海外出版,但很快传到国内,不久,财政部领导和中南海即分别约请王胡二人详细介绍该报告的内容。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推行“分税制”;1994年1月,分税制正式在全国推行,当时的浙江省财政厅长称该报告“触发了中国全面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从酝酿到研究再到正式全面推行,分税制至少走过了14年历程。如果说1980年推行分税制的各方面条

件也许还不是充分的话,那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财政包干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得相当彻底,学术界关于分税制研究也相当充分,但中央政府还是迟迟不能做出推行分税制的决断。直到“王胡报告”提示再不推行分税制,就可能面临南斯拉夫那样四分五裂的命运,才触发了分税制在全国的推行。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项公共政策的推行,不仅在学术上要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很多时候还是要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做的危急情况下才能做出决断。具体到分税制,贾康和“整体协调”改革派等在具体的技术可行性上做了充分的论证,而“王胡报告”则通过提示不如此可能导致的严重政治后果,促使中央政府在当时的历史关键时刻,最后终于做出了必须优先推行分税制的政治决断。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庄周梦蝶】

在民国初年,男人的服饰也是相当花哨的,且由于女性解放的思潮大行其道,男女的衣料均可通用。

民国初期的更衣记

周凯莉

就像蚌和珍珠一样,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尚都和当时的经济、政治环境互相研磨、相辅相成。张爱玲在《更衣记》里这样描述民国初期的着装时尚:“那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和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

作为当时中国的时尚之都,上海各阶层的嗅觉一向都是走在潮流前列的。汹涌而来的舶来文化,使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灵感都来自西方。传统旗装的衣领减低了,甚至被罢黜了,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家庭主妇们开始用上白色丝质的围巾,白丝袜的脚跟上还绣上一

朵梅花,交际花们常常戴着平光的眼镜,张爱玲评论道“舶来品被不分皂白地接受”。

从五四运动开始,被时尚启蒙最为显著的还属初受熏陶的女学生们、女作家们,她们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又囿于周遭的传统环境,和已婚的先生私奔却往往沦为被弃的小妾,羞愤之下,女知识分子们开始排斥传统的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劣根性斩尽杀绝,从很多比较经典的民国初期影片中,也可以看到,那时女知识分子们酷爱的旗袍是方正肃杀的,散发着禁欲主义的清教徒风格。

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与封建专制家庭的爱相相杀、痛苦与挣

扎。书中,他对于处于不同思想维度上的女性进行了服饰上的描写。先进的女学生琴是标准的一头齐耳黑发加竹布改良女学生装,侍妾婉儿则穿了“一件玉色湖绉滚宽边的袖子短、袖口大的时新短袄,系了一条粉红湖绉的百褶裙”,以喇叭袖的时髦短袄追随了当时的潮流,同时也表明受宠的旧式宠妾地位。

随着经济、政治时势的沉淀、后退,及至理想终于支撑不住现实的时候,到了20世纪30年代,女人的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重回清末的禁忌主义风格。不过,对于一些颇具财力的时尚女子来说,则走上了更为新潮的服装改良之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陶太太是当时的一位摩登女子,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绸子

的长衫,只好齐平膝盖,顺长衫的四周边沿都镶了桃色的宽辫,辫子中间,有挑着蓝色的细花和亮晶晶的水钻,她光了一截脖子,挂着一副珠圈,在素净中自然显出富丽来”。现代影视作品《橘子红了》大概是描述民国初期传统与新潮冲撞的经典之作,有钱人家的两位姨太太,周迅扮演的秀禾宽袍大袖,盘着发髻,另一位则俨然是上海洋场上的时尚交际花,风情万种,喜欢曲线毕露的洋装,仅就服饰的比较上,相当有看头。

一个题外话是,不管是民国初期还是当今时势,京派和海派的时尚风格依然代表着经济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标新且灵活多样,带着浓厚的商业气息,京派风格则是官派作风,矜持、凝练,使人肃然起敬。至于粤派

风格,则一向都是中国嗅觉最为灵敏的前沿,况且依靠着香港,更偏向西化,干练、精明,一副实用主义的冷静和决绝。

最后也要提一笔在时尚中往往被遗忘的男人们。在民国初年,男人的服饰也是相当花哨的,且由于女性解放的思潮大行其道,男女的衣料均可通用。但从经年变化来看,无论是中国男人的西装还是新式的中山装,均是采取灰色、咖啡色、深青色的滞重布料,式样也是极其单一的,严谨地遵守着西洋绅士的陈规,至于内心里是否真正达到“男女平权”的地位,单从《色戒》中杀伐决断的冷面易先生便可见一斑了。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缘木求鱼】

如果每个人都争当聪明人,都千方百计地落实自己的“最优选择”,最终的结果就一定得不到最优。

最优选择或许并非最优

木木

没经过生死的考验,许多人的大就很难看得透一些事,尤其在利益面前,就更拿捏不住分寸,把握不住自己那颗驿动的心。

某中关村创业元老级的人物,很不幸,得了癌症,经过积极治疗,病情稳定之后,整个人从里到外“焕然一新”。这大约就得益于对生死的勘破。

有一次,在一个小范围的“恳谈会”上,面对一帮“村儿”里的创业“兄弟”,该元老很感慨地抒发了一些人生感悟:从中关村创业开始算起,这么多年来,我们掰着手指头数,即使曾经排名很靠前的那些高科技企业,为什么最终都很难做大做强呢?影响因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在利益面前,企业的创始人总

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这些创始人,绝大部分都是理工学科出身,多年的学术训练,逐渐使其养成了“追求最优”、“选择最优”、“保持最优”的习惯。这种习惯对做实验、搞研究而言,或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做学问和做企业显然是两码事儿,靠的是两股劲儿;如果做企业的时候,总时时刻刻惦记着、习惯着自己的“最优”,这个企业迟早要出问题。

大意如此。随后,这位令人尊敬的元老还列举了几个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论断;而“躺枪”的这几个高科技企业,都曾很很“如雷贯耳”过一阵子。不错,此公所言确实不谬,因为有无数鲜活例子为他的这个论断做了背书。

把一个企业做好,尤其是把一个高科技企业做好,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就是这个企业的产品、销售、研发投

入、市场潜力、政策支持力度、竞争对手情况等硬指标,而对一些软指标,则重视不够甚至根本就视而不见,比如,企业的创始人对小股东、对管理层和职工的态度如何,而对利益,创始人能否做出“自我牺牲”、照顾到方方面面从而实现皆大欢喜的局面等。

硬指标,对企业的发展固然非常重要,但许多时候,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软指标,却往往决定了企业最终能否做大做强,甚至决定着企业的生死。比如,某中关村高科技小企业,已经“小”了多年了,为什么一直难以变“大”呢?并非因为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市场应用前景不广阔,而是清华工科博士出身、头上光环叠加的创始人,固守着自己的“最优”选择不放,八爪鱼一般,把利益攥得死死的,以致公司里总笼罩着人心惶惶、人心愤愤的氛围,管理

层及职工的流动速度极快,企业也就这样一直“小”下来。

当今的社会,聪明人不少,自矜于聪明的人也不少;高科技企业里,更是聪明人扎堆儿,尤其是这类企业的创始人,许多都够得上“人中龙凤”的标准。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干事业、做企业,创始人、领头人如果处理不好利益分配这个大命题,那么,导致企业分崩离析的种子一定很快就会内生出来并迅速生长、壮大。老天其实最公平,如果每个人都争当聪明人,都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落实自己的“最优选择”,最终的结果就一定得不到最优。

创始人斤斤计较于所谓的“最优选择”,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带领企业最终走向成功的例子当然也不少。华为在这方面似乎就格外成功。相较于公司规模以及所取得的业绩,任

正非所持的股份几乎已达微不足道的地步,但也恰恰是这种不我执的态度,在精神层面影响了华为的性格及价值取向,使公司扎扎实实地一步步壮大起来。

历经生死才能勘破利益纠缠的迷局,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要免于这种悲哀的困扰,其实也并非多么了不起的难事,抬起头看看身边的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大约就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于己而言或许并非“最优”,但于一个集体而言,却恰恰可能是“最优”。不过,这种看似不难的选择,因了需要对灵魂最深处好好打扫一番的前提,对凡夫俗子而言,还是颇有难度的。但也没关系,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满是成功企业了,投资者选择起来,估计就很没有挑战性。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世说新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网络淘尽英雄,点点鼠标账户空。青山依旧在,淘宝何时终?

双十一过后,都拼了

冷秋语

轰轰烈烈地过完了双十一。商家们拼折扣,拼底线;快递员拼诚信,拼速度;网民们拼限时抢购,拼秒杀。如果,这是一场战争,那必定血流成河。拼完以后,商家们笑了,快递疯了,网民哭了。

黑暗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只萤火虫,正闪烁着光芒。只是,那只萤火虫好像有些大,走近了一看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萤火虫,那是快递员打的手电筒。不得不从未见过快递员如此敬业过,这么晚了还来送快递。这让我想起了神风敢死队。神风敢死

队是由二战时期日本天皇设立的敢死士兵组成的自杀性质的敢死队伍,全部由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组成。神风突击队任务危险艰巨,通常是为了扭转战局才赴以使命,生还的几率很渺茫。1939年,日军北上,企图占领西伯利亚,连连受挫后使用了神风突击队。太平洋战争中,面对盟军的最后进攻,一批又一批稚气尚未脱尽的日本青少年,驾驶飞机冲向对方与之同归于尽。

虽然我们的快递员同志的壮举赶不上神风敢死队,但他们亦如蜡烛一般默默地燃烧着自己,只为照亮你拿

到快递时的喜悦。

另外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双十一战果,一边晒着战果一边喊着再买就剁手,然后果然,没过多久再次看到晒战绩。手剁没剁呢?当然没有。手还留着,不然怎么赚钱继续下一个双十一?看过朋友圈最高的账单小一万块,果然是拼了。

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让我们拼命地工作,为了赚钱东奔西走,忙碌奔波。在这其中,我们或许会失去自己原本的快乐与单纯。这不禁让我想起《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先驱梭罗的作品。梭罗于1817年生于马萨

诸塞州康科德镇,就是因为茶叶事件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个小镇,他也是人类不抵抗运动的先驱,现代环保主义的鼻祖。梭罗认为人除了必需的物品,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中愉快地生活。他在19世纪(1848年)干了一件罕见的事情,就是拿了一把斧头,到康科德郊外的林中自己搭建了一座小木屋,然后每年劳动6周,其余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他的一切所需均依靠自己动手获取,这样在湖畔生活了两年。

我还曾听过一个笑话,老公琢磨着双十一来了,知道老婆有网购的习惯,想要给老婆一个惊喜。偷偷地打开

老婆的淘宝,准备将老婆加入购物车的东西全部买来送给老婆。但看完以后,他果断地默默关上了淘宝,因为,里面账单总额竟高达五十多万。

他恍然大悟一个道理,想要满足老婆的欲望,唯有拼了。但愿有天能够轻轻松松地点点鼠标就能够将购物车里的东西全买了。

在此,我只想唱一曲自我改编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网络淘尽英雄,点点鼠标账户空。青山依旧在,淘宝何时终?网民独坐电脑前,惯看账户又空。网络世界喜相逢,古今多少网事,都付笑谈中。

(作者系网络小说家)